

中国当代文学如何更好“走出去”

□本报记者 黄尚恩

回顾2014年,中国文学“走出去”是一个值得言说的话题。在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步伐越来越大,越来越有成效。麦家《解密》的多种外文版热销,阎连科获得2014年度弗兰茨·卡夫卡奖,姜戎《狼图腾》在国内外畅销10年庆典等事件,成为2014年中国文学“走出去”状况的缩影。在这些热点事件背后,国务院新闻办、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作协、国家外文局等部门和组织,积极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对外翻译、对外推广,多个国内出版社与国外版权机构签订合作协议,扎实推进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进程。尽管中国文学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是走在前面的,但是海外对中国文学的了解依然是有限的和零散的,中国的很多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还没有被世界充分认识。这需要我们摆正心态,下大功夫,耐心地培育和建设一个有效的文学交流机制,以水滴石穿的精神来推动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

更多翻译反映中国当下现实的作品

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洪涛看来,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最大障碍是,当前的世界文学体系是以欧美文学为中心的。在西方对中国文学的接受中,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筑起了一道高墙,我们想真正走进去并产生影响是非常不容易的。对此,作家曹文轩也曾提出一个有意思的假设:如果《哈利·波特》是中国作家写的,它会不会流传得那么广?

但是,这些都是无法一时半会去改变的,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必须以接受这些事实为前提。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何明星认为,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首先应该考虑那些具有“世界性”的题材和作品。这些作品讲述的当然也是中国故事、中国经验,它既与当下中国现实密切相关,也与欧美的社会是共时的,容易产生世界范围的反响。而那些具有独特历史意味或者地方特色的作品,我们国内评价很高,也的确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沒有很好的翻译,翻译出去之后也很难被真正接受。

翻译家艾瑞克认为,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受到西方文学很大的影响,所以大部分作家的写法其实都很“国际化”,在翻译上不会存在太大的问题。可能有些作品涉及特别具体的历史阶段、特别专门的地方知识,才会出现理解上的困难。到目前为止,中国当代小说已经被翻译出去很多部了,但大多都是写历史、写乡土的,因此一些国外出版社也

试图出版年轻作家写的有关当代中国的作品。

建立更好机制鼓励文学翻译

刘洪涛近期正在参与“今日中国文学”英译丛书的翻译工作。刘洪涛说,在选择作品时,肯定是选择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但是作品选好之后,有时候却找不到与之相符的译者,只能另选别的篇目。因此,应该不断发掘更多优秀的青年翻译人才。近年来,中国作协积极进行优秀翻译人才的挖掘和培养。2014年,由中国作协主办的第三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16个国家的30位汉学家、翻译家以“解读中国故事”为主题展开热烈讨论。中国作协还与文化部、中国社科院共同主办了“2014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来自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汉学家来到中国,聆听名家大师的学术讲座,走进街头巷尾体验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中国青年作家对话交流。这些都为青年翻译人才的成长提供了帮助。

艾瑞克认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工程的实施,的确为居住在中国、以英语为母语的中国文学译者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极大地提高了翻译的稿酬。他目前在翻译工作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去说服国外的出版社,让他们愿意出版自己想翻译的作品。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国外出版社先确定好意向、购买了版权,再寻找翻译。可现实并非如此,西方出版商对中国文学知之甚少,所以就很难会去购买版权,这就需要翻译者尽量提供充分的背景信息去说服的工作。因此,应该不断完善双方互相沟通的机制与渠道,调动出版人、经纪人、翻译家等各方面力量的积极性。

何明星最近在“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对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图书馆的入藏情况进行检索、统计发现,2014年在海外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作品有100多种。麦家的《解密》、余华的《黄雀里的男孩》、吴明益的《复眼人》是被收藏最多的3种图书。何明星认为,中外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阅读,时间差在不断缩短。在这其中,一些跨国出版集团的参与不可忽视,来自欧美的文学经纪人开始关注中国的文学新秀,寻找值得翻译的优秀作品。这些跨国集团中,有许多都是世界超级畅销书的推手,他们的加入,使中国当代文学在全世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知名度,并且日益成为阅读中国、了解中国的一个最为便捷的窗口。

摆正心态,“对外”其实是为了“对内”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无论是中国作家还是出版者,心态摆得越来越正。莫言曾说,作家不能“为了翻译的容易而降低自己作品的高度和难度”,越来越多的作家意识到,要将目光投向世界,但要避免按照他者所想象的世界观、国际风格来写作。为全世界、全人类而写当然好,但首先得为自己的同胞、自己所生活的土地写作。

在汉学家葛浩文看来,中国文学要想更好地“走出去”,首先要注重作品的质量本身。很多中国当代小说,按照中国人自己的标准来看可能问题不大,但在翻译的过程中,他觉得完全可以写得再简练一些,有些常识性的错误完全可以避免。此外,中国作家可以更加深入地对人物心灵进行探索,使人物形象真正烙印在读者的记忆里。艾瑞克也谈到,有一些中国小说,故事写着写着就不知道写到哪里去了,在语言上用了大量的修辞,像一锅粥。这可能与中国编辑地位不高,把关不严有关。在国外,一个作家的作品在出版时,会经过编辑的严格修改。从中文翻译过去的作品,不是翻译者删改,更多是编辑按照他们的审美趣味来删改。

在刘洪涛看来,中国文学“走出去”并不是只有翻译这一条道路,作家力量的培养、写作题材的聚集都可以帮助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国的青年作家越来越具有国际视野、国外生活经验,他们会写出更多跨文化题材的作品;很多华裔作家使用英文、法文等居住国语言写作,扩大了中国题材作品的影响;海外华文作家作品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他们的作品会聚集在“中国题材”“中国故事”“中国经验”等概念下,产生整体性的影响。此外,中国文学对日本、韩国、越南等周边国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多方交汇形成一个小的文学体系,在整个世界文学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当代文学以其庞大的体量会更加引起世界读者的关注。

我们积极推动对外翻译,但不能忘了“文学的初心”——写出真正好的,能够感染读者的作品,无论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因此,我们如此密切地关注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与其说是“对外的”,毋宁说是“对内的”,也就是说,能否“走出去”和如何“走出去”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要根据“走出去”过程中得到的来自他者的反馈,更好地调整、建设自己,树立起我们真正的文学自信。

主持。在极具闻西特色的开场歌舞《幸福采茶灯》的喜庆祥和氛围中,演出拉开了序幕。殷秀梅的一首《光荣》,讴歌党领导我们的人民军队从古田出发,开始光荣的梦想和新的征程;《映山红》《红军不怕远征难》《一二三四歌》等一批反映革命战争年代的情景歌舞,让人们在重温火热革命激情的同时,领悟了古田会议精神的财富、影响及感召;《好男儿就是要当兵》,令人想起无数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牺牲的闽西儿女;《我的中国梦》《美丽中国》《我的梦中国梦》等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唱出了人们对祖国浓浓的爱。整场节目形式多样多样,有歌舞、相声、独唱、戏曲,还有魔术互动等情景表演。当李维康、阎维文、刘和刚、韩磊、阿鲁阿卓、莫华伦、刘媛媛、张英席、TFBOYS组合等艺术家和青年歌手唱出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时,现场爆发出一阵阵热烈掌声。

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央文明办主任黄坤明等与闽西两千余名干部群众观看了演出。

新华社贵阳1月4日电(记者 李平 李惊亚) “苗岭秀,旭日升,百鸟啼,报新春。遵义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4日下午,遵义会议会址外广场歌声高亢、掌声雷鸣。

在改写中国命运的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之际,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走进贵州遵义市,为老区人民奉献了一场主题为“2015我们的中国梦”的精彩演出。该演出也是中宣部等五部委联合开展的2015年元旦春节期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项目之一。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80年前,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彪炳史册的遵义会议。会议明确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也因此成为中国革命的“转折之城”。

老区人民听闻“心连心”艺术团4日走进遵义,并先后在遵义会议会址与遵义县枫香镇花茂村举行两场慰问演出后,心情激动,2000多名干部群众到现场观看了演出。

两场演出分别由朱迅、张泽群、尼格买提、热合曼、张蕾主持。4日下午的主会场,一首首动情快的《心连心》歌曲拉开了表演的序幕。耿莲凤的一首《遵义会议放光辉》,唱出了在革命危急时刻,毛主席带领红军化险为夷,扭转乾坤,把中国革命带向新的胜利与征程的激情岁月。《红军战士想念毛主席》《四渡赤水出奇兵》《十谢共产党》等一批反映革命战争年代的悠扬歌曲,把人们拉回到革命的艰苦岁月,让人回想起中国工农红军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做出的卓绝努力与重大牺牲。《鼓动天地》《张灯结彩》《共筑中国梦》《我们共同的家》等豪迈明快的歌曲,则唱出了老区人民当下幸福生活的喜悦之情与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祝愿之意。

两场演出主要由“红色遵义”、“绿色遵义”、“多彩遵义”三个部分组成,以歌曲、小品、相声、杂技为主要表现形式,演出既接地气又催人奋进。蔡国庆、吕继宏、王莉、张英席、魏金栋、汪正正、阿幼朵、阿宝、正月十五组合等艺术家和基层群众共同演绎了一曲“中国梦大合唱”。

促进民族文学的影视表达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中国作协创作联络部联合主办,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剧本部承办的“新思路·新实力·新跨越——民族文学影像时代”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作家、编剧、学者及影视从业人员汇聚一堂,分享关于“民族文学影像时代”的观点和看法。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主任丹增、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白庚胜、国家民委宣司司长武翠英出席了此次会议。

丹增在讲话中说,这次研讨会是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以后,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学、影视事业的一次具体举措,也是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的一次阶段性回顾和展望。他认为,繁荣发展少数民族影视,要紧紧围绕剧本、演员、制作、运营等各个环节,充分重视影视在民族地区文化产业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以文化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繁荣。白庚胜认为,对于少数民族文艺工作者来说,找到民族文学与影视的嫁接点,找好对话的角度,找对合作的平台,使少数民族文学更多地得到影像转化,也使少数民族影视更多地吸收文学资源,最终实现“写优秀小说,出品精品剧本,拍经典影片”的目标,这是当前形势下需要致力的重要环节。武翠英谈到,要把电影工程放到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和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高度和角度来认识、来把握、来落实。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迎来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全新时代,应迎难而上,发挥优势,特别是要为20多个尚没有本民族题材电影的民族填补空白。

叶梅、范咏戈、石一宁、牛顿、赵晏彪、肖惊鸿等与会者围绕少数民族文学影视转化的意义、问题和路径,以及少数民族影视人才培养的新机制、新思路,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大家认为,在文学传播样态多元化的当下,民族文学的影像转化势在必行。各民族作家、电影人有责任、有义务发出民族的声音、时代的声音、人民的声音,努力成为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和进一步的创造者,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精品力作。

“第三届少数民族题材优秀影视剧本遴选”活动也在此次会议上正式启动。遴选活动由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剧本部、北京国际电影节民族电影展组委会、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联合举办,致力于发现和培养少数民族中青年剧作家,促进少数民族优秀文学作品的影视转化,进一步丰富中华多民族文化版图。

(石彦伟)



由吴天戈导演、黄亚洲编剧的影片《毛泽东在上海·1924》近日在上海举办了首映礼。影片讲述了1924年国共合作时期,青年毛泽东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和生活的故事。电影以杨开慧来沪照顾毛泽东为引子,牵出当时反动军阀和国民党右派想以杨开慧母子挟毛泽东、阻碍国共合作的一段史实,刻画出青年毛泽东追求梦想、寻找中国成功道路的革命人生。影片较多地涉及了青年毛泽东的家庭生活。这是毛泽东与杨开慧在一起生活时间最长的一段日子,从而让人们看到了毛泽东日常生活的一面。

(欣 闻)

“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 推荐活动启动网络投票

本报讯 2014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推荐活动迎来了关键的网络投票环节。从1月1日起至31日,读者可登录人民网文化频道、中国新闻出版网、新华网移动端、中国电信翼阅读微信公众平台等途径,浏览候选图书信息并进行网络投票,最终选出2014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

此次候选的100种图书是在30家媒体推荐、全国出版社自荐、市场发行数据检验、权威专家评审的基础上产生的,包括文化类20种、文学类30种、生活与科普类20种、少儿类30种,皆为2014年图书市场各类热销图书。

其中,有主题出版重点图书,如《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邓小平传》;有新老作家的文学新作,如杨绛的《洗澡之后》、贾平凹的《老生》、刘醒龙的《蟠虺》、笛安的《南方有令秧》;有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奖图书,如《上庄记》《女子中队》《瓷上中国》等。

本次推荐活动将根据投票结果,最终确定2014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文化类10种、文学类15种、生活与科普类10种、少儿类15种),并于春节前向社会公布。

(欣 闻)

顾骥同志逝世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原副主任顾骥同志,因病于2015年1月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顾骥,1930年2月出生于江苏盐城,1944年11月参加革命工作,195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在新四军苏北文工团、苏北华中工委、人民出版社工作。1955年起,先后在文化部出版局、中央文化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任教。1972年在国务院文化组工作。1980年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工作。1985年任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主任,1991年离休。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顾骥同志长期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和文学评论工作,他从1953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顾骥文学评论选》《夜籁——散文随笔选》《新时期文学纵论》《第边草》《煮默斋文钞》《晚年周扬》《新时期小说论稿》,以及哲学著作《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合著)等。还撰写了若干戏剧论文和散文。